

屠格涅夫散文精选

世界散文八大家

柳鸣九 主编



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屠格涅夫

散文精选

刘文飞 编选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屠格涅夫散文精选 / 柳鸣九主编; 刘文飞编选.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 5
(世界散文八大家)
ISBN 978-7-5507-0912-6

I. ①屠… II. ①柳… ②刘… III. ①散文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7971号

屠格涅夫散文精选

TUGENIEFU SANWEN JINGXUAN

出品人 陈新亮
责任编辑 陈 嫣 林星海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深圳斯迈德设计
0755-83144228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 (批发) 83460397 (邮购)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70千
版 次 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5月第1次
印 数 1—4000册
定 价 39.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序：散文的疆界在哪里

◎ 柳鸣九

“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是这些年来已经出版过的多种世界散文选中，较为别具一格、多少另有新意的一种。其新意就在于编选成集的角度不像过去一些选本那样是以国别分集，而是以作家个人成集。其作家总数，则不多不少，恰好是八位。显而易见，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数字文化：八仙过海、唐宋散文八大家、武学八大金刚，甚至烹调术中的八珍丸子……都是古已有之。正是出于这种沿用传统的意识，深圳海天出版社前几年请季羨林先生主编了一套“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丛书，出版后颇获成功，现在余兴未尽，又约请我主编这套“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以期构成他们散文出版中的“双壁”。这便是这一套书的来由。

世界散文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历史，各国的散文文库也有其客观的存量，都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与好恶为转移。如何选？选多少？是取其六，还是取其八？都不是一个绝对真理问题。而选这一些，不选那一些，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关于本套书所选的这八位，我只能说是根据我个人对世界散文历史的认知，选取了我心目中较有影响、较有广泛声誉者。而在思想艺术风格上，则选取了较大程度上投合更广泛读者的口味者——也就是说，力求避免过于保守或过于前卫。这种选法实不敢期望能获得所有行家知者一致赞同，至于这

八位散文家的思想价值与艺术风格，已分别由各卷的编选者加以论述，就用不着我再赘述了。

倒是有一个问题，这里必须着重加以说明，那就是：散文的国土有多大？它的疆界在哪里？它的边缘如何划定？因为，凡读论散文者，凡编选散文集者，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地域学问题。

文艺理论家、批评家对散文如何下定义，如何作界说，文艺学讲义、博士学位论文对散文如何进行辨析，这只是学术象牙塔里的事、云端里的事，一般的阅读者往往是不大理睬的。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里，经常流通、为人常见的那些文化成分，对于人们文化观念、文化模式的形成，总是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至少也起着约定俗成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不难理解，一般的阅读者的散文理念、散文模式，往往不是来自教科书与学位论文，而正是来自他们常见到的、常读到的那些散文作品。

在中国能识字读书的人群中，出身于书香之族、家学源远流长、自幼饱读经史的“上帝的选民”，乃极少数，多数人所受的教育都是“大众型”的。根据我自己以及我周围人群的经历，在一般人所受到的那种“大众型”的启蒙教育与中小学教育中，《唐诗三百首》与《古文观止》是两位重要的老师。而《古文观止》对这“大众型”的智识层在形成民族传统散文的概念上，正起了某种准绳式的规范作用。特别是其中像《陈情表》、《归去来兮辞》、《滕王阁序》、《陋室铭》、《进学解》、《岳阳楼记》、《醉翁亭记》、《赤壁赋》等这样一些为青年学子广为传诵的名篇，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散文典范。

“五四”以后，散文大为发展，于是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里，又多了一些传诵的名篇：《背影》、《荷塘月色》、《寄小读者》、《我所知道的康桥》等等。中国散文中这个一脉相承的传统，实际上代表了整整一个族类，其特点是抒写的内容不超出自我的半径之内，或为自我的见闻与感受，或为自我的辨析与哲理。不外园林山水、花鸟鱼虫的景观，修身养性的道理，经历行止、身边琐事的感言。形式上则单独成篇，文章结构内敛凝聚，布局谋篇甚为讲究，遣词造句力求精练，通篇追求自我的性灵、雅美的意趣、闲适从容的情致。所以，只要一讲起散文，人们首先就想到了这个族类，就把这个族类当作散文的本

体、散文的“王室”。

这就是一般人的散文观的由来，也是一般人心目里的散文范畴、散文领地。这种散文范畴观可以说是在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因为人们是出于愉悦的需要而向这种散文倾斜的——要知道愉悦的需要毕竟是芸芸众生在文学阅读中最原始自然，而又合情合理的需要。

现在，在散文的国土问题上，让我们把亚里士多德、文艺学讲义、辞源与博士学位论文放在一边，从简单的文学事实出发吧。

对于文学的发展来说，书面文字的产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文学史往往都把文学的起源上溯到书面文字的出现。文字产生之后，其用于人类各种活动中不外记事、论说与歌咏等各种形式，并由此自然而然地讲究到文字上的修辞与技巧。如果说文字的产生以及修辞学的运用，离诗歌、小说、戏剧还很远的话，那么它们离散文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不要以为直接用于人类的祭祀鬼神、公文告示、记事备忘、奏启呈文等等各种实际活动的书面文字，是绝对与散文无关的——好像虫蛆怎么也变不成蝴蝶——恰巧相反，直接为这些实际活动服务的书面文字，只要说得头头是道、明晓透辟、情词并茂，就很容易可以上升到散文的范畴：辞职书写得恳切感人，便有了李密的《陈情表》；与朋友闹纠纷讲理头头是道，便有了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祭鬼神、慰亡灵之作写得悲怆苍凉，便有了《吊古战场文》。诸葛亮的《出师表》其实就是打上去的一份政策分析报告，骆宾王的《代徐敬业传檄天下文》便是一张写得很讲究的公文告示，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也不过是写得义正词严的“党争”中短兵相接的争辩。而这些文章，都已经成为了中国散文中公认的精品。

众所周知，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早于文学活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也远远大于文学活动的需要，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实际文字语言，正是散文可能滋生也比较容易滋生的温床。如果笔者不是在歪着嘴巴说理的话，那么就可以下结论说，散文艺术是文学中最古老的艺术，它的资格比小说艺术与戏剧艺术都要早；而散文又是文学世界里疆界最大的王国，它的幅员比小说与戏剧要大得多。

其实，在文学世界的版图上，除了诗的王国外，剩下的就是散文的莽原了。戏剧与小说这两个王国，也基本上是在散文的莽原上建立

起来的，而且是后来的事。没有散文做基础，小说与戏剧这两个王国的独立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小说与戏剧有了高度发展之后，我们仍经常在它们的殿堂里俯首可见由散文所构成的殿堂地面——雨果的《悲惨世界》中滑铁卢一章，实际上是法国人大制作的惨烈悲凉的《吊古战场文》；博马舍的名剧《费加罗的婚礼》中主人公那段在剧本里举足轻重的著名独白，本身就是可独立成篇的绝妙的散文自述；契诃夫的独幕剧《论烟草有害》，其实就是一篇幽默讽刺散文；夏多布里昂的小说《阿达拉》的“序幕”早已被公认为一篇写景的上好佳品。

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需要与可能来看，产生散文的层面与途径远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同样，从写作者的条件与可能来看，产生散文的层面与途径也比诗歌、小说、戏剧来得广泛。因为不论是诗歌、小说、戏剧的创作，都需要一定的专门艺术技巧，而散文的写作则相对要简单一些。不论是出于政治、经济、宗教、社会人际关系及交往的需要，还是出于学术文化与哲学思辨的热情；不论是由于现实景观与见闻的引发，还是个人心绪与性灵的萌动，只要具有优良的语言修养以及谋篇布局的技艺，有意识地追求一定的艺术意境，或大则成书，或小则成篇。即使从简营造，短小精悍，皆可成为散文佳品。

因此，在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散文的创作量往往实际上要大于诗歌、小说与戏剧的创作量。由于性质与内容的不同，它又有着哲理散文、历史散文、记事散文、描述散文、抒情散文、政论散文、文化散文以及交往应酬散文等等各种门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散文帝国。如果只承认闲适性的散文才是散文，岂不就把其他种类数量庞大的散文拒于法门之外，让它们成为野鬼孤魂？如果只把散文的领域局限于闲适性的散文，那岂不是把散文王国的大片领土生割出去，弃之不顾？如果不把它们称为散文，又称为什么呢？照笔者的理解，那些广为传闻的闲适美文精品，可说是构成了散文王国的紫禁城，然而，在紫禁城之外，还有更大的京畿，还有辽阔的外省边陲。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就把这种闲适性的散文称为“散文小品”，甚至称为“小摆设”，显然就没有把它当做

一个“泱泱大国”来看待。

本着以上的理解来规划这套散文选集，我们有意识地拓宽了选题的范围，将一些历史论著、哲理著作、政论演说、文艺评论、回忆录，以及日记书信中有文采、有一定形象性、堪称经典散文的佳篇选入。也许，在这里，散文的边界有时会显得有点模糊，但总比割舍了一大片领土要强。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立意。

文化积累是一项社会性的、需要大家添砖加瓦的工程，对世界散文的研究、梳理、编选、译介的工作也是这样，但愿各种选本相得益彰，各自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读者认为我们这套选集也添加了一些自己的东西，我们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选本序：屠格涅夫的散文

◎ 刘文飞

1983年10月，一个天色有些阴沉的傍晚，我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姜椿芳先生在鼓浪屿的海滩上漫步，当时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我，有幸与姜先生等一大批前辈学者共同参加在厦门大学举行的屠格涅夫研讨会。漫步海滩的话题依然与屠格涅夫相关，姜先生向我谈起这样一个“典故”。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次中苏领导人会面之后，斯大林让苏方翻译接待人员留下来，气呼呼地表达了对他们的不满：你们刚才听见人家中方翻译（据姜先生说是刘泽荣）说的俄语了吗？多么地道流畅，我不清楚你们的中文水平，但是你们的俄语反正不如那位中国人，他说的是纯正的屠格涅夫语言！

即便是在斯大林这样的政治家心目中，“屠格涅夫语言”也成了“最美俄语”的同义词。

为了参加那次会议，我也写了一篇题为《屠格涅夫的抒情诗》的小论文，即便所分析的是屠格涅夫起步时期的文学试笔，我依然能感觉到屠格涅夫文字的精致和优雅。姜先生的那段转述，更是让屠格涅夫的语言之美如同傍晚南海上变幻莫测的低云一般，从此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心底。

二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1818年11月9日生于俄国中部奥廖尔省一个富裕大地主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4岁时即已熟练掌握法、德、英三种外语。1833年起，屠格涅夫先后进入莫斯科大学和彼得堡大学学习，1838年前往柏林大学学习哲学，1841年回国时曾试图任教大学，任职官场，但均不成功。1843年因长诗《帕拉莎》获得别林斯基赞赏后，便放弃一切其他尝试，专心于文学写作。

1843年11月，具有西班牙血统的法国歌唱家波琳娜·维亚尔多来彼得堡演出，屠格涅夫被她迷住，从此终生追随她游历欧洲，1847年后更是常年居住法、德等国。1845年，屠格涅夫与他那位专断跋扈的母亲决裂，其原因除了屠格涅夫痛恨母亲身上所体现的农奴主做派，母亲也反对他从事“危险的”舞文弄墨工作之外，与维亚尔多的恋情亦为一根导火索。失去家庭资助后，屠格涅夫被迫过起流浪文人的生活，但在母亲于1850年去世后，屠格涅夫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大笔财产的继承者。

1847年，屠格涅夫开始在《现代人》杂志上不定期地连载《猎人笔记》，引起巨大轰动，从此成为俄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此后三十余年时间里，屠格涅夫不懈写作，写出一部又一部文学名著，成为可与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比肩的文学巨人。他留下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等长篇小说名篇，构成了一部19世纪40至8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艺术画卷。

19世纪中后期的数十年，亦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黄金时期，屠格涅夫是为数不多贯穿这一黄金时期的俄国大作家之一，他始终是俄国文坛的中心人物，他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和绵连的争论。

1858年，屠格涅夫的《阿霞》发表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撰写了一篇题为《俄国人赴约会》的评论文章，认为屠格涅夫小说中的主

人公所表现出来的萎靡不振、犹疑不决的气质，已表明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俄国社会生活中正在失去进步意义，这篇文章不仅受到安年科夫等人的激烈反驳，也引起了屠格涅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不满。

《前夜》发表之后，杜勃罗留波夫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叫做《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认为屠格涅夫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呼唤一个新时代的来到。杜勃罗留波夫对《前夜》的这一“革命性”解读让屠格涅夫很难接受，他因此与《现代人》阵营彻底决裂。关于《父与子》的争论，更是西方派阵营正式分化为自由派和民主派的一个标志，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之所以写作《怎么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与《父与子》进行论战，构成对比。小说《父与子》的出版所引起的激烈争论，也可被视为屠格涅夫自己政治立场和艺术态度之冲突的反映。屠格涅夫构思《父与子》的初衷，原本是为了弥合两代人之间的隔阂，没想到，这部作品却激起了最为激烈的讨论，在各个方面均不叫好，用屠格涅夫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有些人指责我侮辱了年轻一代，骂我落后反动，他们关照我说，要带着‘轻蔑的笑声烧掉你的相片’；相反，另一些人却愤怒地责备我随意奉承这年轻一代。”赫尔岑写作了题为《父辈已成祖辈》一文，对《父与子》及其作者进行嘲讽和抨击。针对相关指责，屠格涅夫很不以为然，他在《关于〈父与子〉》中的一条脚注中对某些庸俗的评论发了这样一通“牢骚”：“人们举出许多论据来证明我‘对青年有仇恨’，一位批评家还援引了我让巴扎罗夫在打牌时输给亚历克赛神甫这件事情，作为论据之一。他说：‘作者简直不知道怎么样辱没和贬低他才好！他连玩牌都不会！’毫无疑问，如果我让巴扎罗夫打赢了，那位批评家一定又要洋洋得意地叫道：‘事情不是很明显吗？作者想暗示我们：巴扎罗夫是个赌棍！’”由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提出的“虚无主义者”这一概念，引起了尤其激烈的讨论，并使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对峙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了“自由派”和所谓“虚无主义者”的对立。

在《父与子》之后，屠格涅夫的《烟》和《处女地》等作品一次又一次地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在不同的思想阵营获得截然不同的评价。屠格涅夫作品的这些“遭遇”，恰好说明他的小说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真实状况和社会中的矛盾，构成了那个时代思想生活

的艺术记录。一位屠格涅夫研究者关于《父与子》所说的一段话，似乎也可以被用来说明屠格涅夫曾引起争论的其他所有作品：“围绕小说进行的激烈争论，最初使作者感到沮丧。他似乎觉得这意味着作品的完全失败。实际上正好相反，这些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部小说里展开的那些争论在现实生活中的继续：激烈的争论说明作品写得生动，动人心弦，没有一个读者对作品能无动于衷。这是巨大的成功，尽管这个成就来之不易，而且往往使作者不十分愉快。”

屠格涅夫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俄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斗争的观照，因而也就必然会涉及对不同价值取向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究和思索，屠格涅夫的每一部小说都暗含着争论，是真正的思想小说，他是在不懈地通过自己的小说、以艺术的方式介入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斗争，从而成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比肩的俄国三大小说家之一。

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在巴黎郊外的小镇布日瓦尔辞世。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葬于彼得堡的沃尔科夫墓地。

三

被视为伟大小说家的屠格涅夫，其创作体裁其实十分多样，从抒情诗、长诗和散文诗到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更有大量的特写、评论、戏剧和回忆录等等。若以中国文艺学传统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体裁划分标准来看，屠格涅夫无疑是一位真正的“全能作家”。但在一般俄国读者心目中，屠格涅夫仍主要是一位“散文作家”（прозаик）。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和西方文人心目中的“散文”和“散文家”的概念并不完全等义，俄国人所言的“散文家”屠格涅夫的创作，其实就是他除诗歌之外的所有“非韵文”作品；而我们心目中的“屠格涅夫散文”，则似乎主要是指他那些“非叙事美文”。然而，即便以中国人的散文观看待屠格涅夫的文学创作，我们仍然能在其中发现三个典型的“散文板块”，即《猎人笔记》、《文学和生活回忆录》和《散文诗》。

关于《猎人笔记》的体裁特征，俄罗斯学者曾给出多种定义，如“短篇小说”、“随笔故事”、“渔猎笔记”、“风俗特写”等等，不一而

足，其实，用中国的“散文”概念来概括它们或许最为贴切。因为，《猎人笔记》所具有的诸多文体特征，诸如第一人称叙述、情节淡化、非虚构故事、作者主观意识和情绪的深刻渗透、白描的人物和诗意的写景等等，无一不是汉语散文最为典型的元素。作为屠格涅夫的成名作，《猎人笔记》的叙事方式后一直为作家本人所沿用，并最终成为屠格涅夫总体风格的重要构成。《猎人笔记》的第一篇《霍尔和卡里内奇》于1847年刊于《现代人》杂志，在之后五年时间里，屠格涅夫陆续写出22篇，后以《猎人笔记》为题出版单行本。20年后，屠格涅夫又将《契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大车来了》和《活骷髅》加入《猎人笔记》，共得25篇。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从中选出8篇。

《文学和生活回忆录》也是屠格涅夫生前亲自编定的一部文集，共收文12篇，其中最早的一篇《关于夜莺》写于1855年，最晚的一篇《海上失火记》写于屠格涅夫临终前不久，时间跨度很大，但集子中的文章多数写于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回忆录”向来是西方文人最常用的“散文”文体之一，其内容不外对逝去岁月的追忆、对亲朋好友的缅怀以及关于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思考，屠格涅夫的这部回忆录也不例外。

伟大的小说家屠格涅夫起步于抒情诗和长诗，而他的绝唱则是以诗与散文相结合的方式完成的，即《散文诗》。和《猎人笔记》一样，《散文诗》这个后来成为作品总题的书名也是编辑顺手加上去的，但它却仿佛构成了关于屠格涅夫整体创作一个最为直观而又形象的概括。

从创作体裁变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屠格涅夫整个创作大致可划分为六个阶段，或曰六个板块，即：1.抒情诗；2.随笔故事；3.现实长篇；4.回忆录；5.中短篇小说；6.散文诗。不难看出，其中的2、4、6均为“散文创作”阶段，我们自屠格涅夫的创作历史中截取这三个断面，试图拼接成一幅屠格涅夫散文创作的全景图，无论是“笔记”、“回忆录”和“散文诗”等体裁差异，还是处女作、长篇写作之余的“歇脚”和最后“绝唱”等历史特征，都既能让我们感觉到屠格涅夫散文的博大精深，又能使我们充分意识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屠

屠格涅夫散文创作。

笼统地说，这三组散文的主题分别主要是现实生活、文学往事和哲人情怀；从形式上看，它们从小说故事到回忆录再到散文诗，其叙事性越来越弱，抒情性越来越强，文字越来越简洁，意象也越来越具象征意味，可大致归为叙事散文、论述散文和抒情散文三大类。然而，它们毕竟都出自屠格涅夫之手，因而也具有一些共同的风格特征。

首先，是诗意抒情的氛围。屠格涅夫是一位小说家和散文家，可他的文学生涯却起步于诗（早期的抒情诗和长诗），也终结于诗（散文诗），此外，他的小说和散文也素以诗意见长，无论是《猎人笔记》对俄罗斯农民和俄罗斯自然的如画描摹，还是其长篇小说中如梦如幻的氛围营造，无不浸润着浓浓的抒情意味。冈察洛夫在读了屠格涅夫的小说后不禁赞叹：“诗歌和音乐，这便是你的手法。”其次，是富含哲理的内涵。屠格涅夫在俄国的大学读的是哲学系，后又留学当时欧洲哲学的中心柏林大学，接受过最为严格的哲学训练；他生活、写作在一个俄国文化史上的理想主义时代，像与他同时代绝大多数俄国作家一样关注俄国社会生活，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尽管屠格涅夫在其文学作品中通常尽量避免直接的议论和纯逻辑推理，但他严谨的思维能力和深刻的哲理素养却时时处处体现于其作品中，在《文学与生活回忆录》中那些政论性较强的文章中，在晚年的散文诗中，这一点均得到醒目体现。最后是真诚自然的心态。文如其人，风格即人，屠格涅夫善良随意的天性在其作品中无处不在，而他的文字也是他的性格之最佳体现形式之一。他的散文节奏舒缓宽松，从容不迫，再加之与人为善的口吻和浑然天成的结构，共同构成一种大手笔散文的典范。

四

1847年，屠格涅夫把一篇题为《霍尔与卡里内奇》的特写寄给涅克拉索夫主办的《现代人》杂志，编辑在决定刊发这部作品时为之加了一个副标题：《摘自〈猎人笔记〉》。之后，屠格涅夫陆续在该刊发表了20余篇“笔记”。1852年，《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

《猎人笔记》的发表构成一个伟大的文学事件和社会事件。以往

的俄国文学史家大多将《猎人笔记》归类为短篇小说，当做一部典型的批评现实主义作品，可我们若将它们当做地道的“散文”来阅读，或许反而能更解其中之味。因为，这部作品的巨大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正来自于其“非虚构”的叙事态度、“化整为零”的“形式策略”以及对俄国自然和普通俄罗斯人的诗意赞美，换言之，正来自这部作品的某些“散文化”特征。

当时的批评家和读者如果完全将《猎人笔记》视为一部虚构的小说，它或许反倒不会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效果。《猎人笔记》如果不是一篇一篇单独发表，如果没有被冠以“摘自《猎人笔记》”这一似乎无关痛痒的书名，原本就未必能通过当时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有两个后来发生的事情可以作为佐证：《猎人笔记》单行本出版后，批准出版此书的书刊检察官旋即被革职；此后不久，屠格涅夫本人也被捕并遭流放，他的罪名是为果戈理写了一篇过于大胆热情的讣告，但当局的实际用心还是想惩罚《猎人笔记》这本捣乱之作的作者。据说，此书给后来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留下强烈印象，使他最终做出了废除农奴制的决定。

在《猎人笔记》中，屠格涅夫对俄国农奴制度的揭露和抨击也很有“策略”，他通过对美的歌颂来抨击丑，通过对俄国农民崇高品质 的揭示来反衬他们的压迫者之卑下。屠格涅夫的这些笔记大多写于国外，在将故乡与侨居地做比较时，屠格涅夫在对祖国怀有深深眷恋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觉到了俄国农奴制社会的不合理和不道德。他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当初之所以出国，是因为“不能同我憎恨的对象并存，呼吸着同一种空气”，“我必须远远离开我的敌人，以便能从我所处的远方更有力地向它进攻”。他还说：“假若我留在俄国，我就肯定写不出《猎人笔记》。”《猎人笔记》结构随意，并无叙事主干，各篇或写景，如《森林和草原》，或写人，如《霍尔和卡里内奇》，或为主人公与叙事者的交谈，如《希格罗夫县的哈姆雷特》，或为无意听来的谈话，如《幽会》和《别任草地》（又译《白净草原》）。然而，《猎人笔记》却有着一个贯穿的主题，这便是俄罗斯大地的优美以及与这大地同样优美的俄罗斯农民。作者对这些农民的描写显然带有更大同情，胜过他对上层阶级之态度。他笔下的地主要么粗俗残忍，要么事

事无能，而他笔下的农民则大多富有深刻的人道精神和诗意的禀赋。这些富有力量和才华、自尊和智慧的人们，却被那些凶恶卑鄙的人所压迫，所统治，却生活在一个没有自由和平等的社会里！如此一来，现实的不公和荒谬，农奴制的残酷和不合理，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正是以这种心平气静、悄无声息的方式，屠格涅夫向俄国农奴制发出了最为强烈的控诉。

在应柳鸣九老师之邀编选这本文集时，我正在翻译一部英文版《俄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中有一段论及《猎人笔记》中《歌手》一篇的文字写得十分出色，特引来放在这里（D.S.Mirsky: *A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Alfred A.Knope, INC, 1927, pp. 243-244）:

自文学角度评价《猎人笔记》，无论怎样赞誉均不为过，即便并非总是这样，亦常常如此。如若说那幅40年代理想主义者肖像（《希格罗夫县的哈姆雷特》）仅为罗亭等形象之预备性素描，那么，在乡村风景的描绘和农民性格的塑造上，屠格涅夫后来则从未超越诸如《歌手》和《别任草地》这样的杰作。《歌手》尤为突出，即便在《初恋》和《父与子》面世之后，它仍可被视为屠格涅夫的最高成就，是其艺术之一切最独特品质的典型体现。故事描写乡村酒馆里的一场唱歌比赛，竞赛者是农民亚什卡·图罗克和来自日兹德拉的一位商人。亚什卡与生俱来的天赋战胜了那位日兹德拉人的纯熟技巧。这部作品的俄语原作之优美难以言表……《歌手》亦可被视为屠格涅夫散文最杰出、最典型之作。它写得小心谨慎，不乏一定程度的刻意造作，可它给人的印象却是，其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均散发着绝对的轻盈和简洁。此为一种精挑细选的语言，十分丰富，却又绝妙地回避了那些会令读者感觉不快的粗词俗句。其景色描写之优美，主要得益于对精确得体的描述性字眼之选择。这里没有果戈理式的装饰性意象，没有铺张夸饰的节奏，没有华丽的抑扬顿挫。但是时而，在句子之间那种小心谨慎、手法多样、不显山露水的完美平衡中，显然能感觉出一只诗人之手，或诗人学生之手。

值得注意的是，米尔斯基毫无保留地将《歌手》称为“屠格涅夫的最高成就”，“其艺术之一切最独特品质的典型体现”，“屠格涅夫散文最杰出、最典型之作”，而我们先前在对《猎人笔记》乃至屠格涅夫整个创作的解读时，似乎从未将《歌手》置于如此高度。

五

屠格涅夫自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写作并发表《文学与生活回忆录》。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烟》于1867年发表后，与他之前的长篇《前夜》和《父与子》一样再次在俄国文学界和俄国社会引起激烈争论。此次争论似乎更让屠格涅夫焦虑，因为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同时得罪了读者的左右两翼”。因此，他便打算以某种更为直接的方式与读者交流，而写作回忆录，把自己的往事和经历和盘托出，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在初次发表《文学与生活回忆录》的《代前言》中，屠格涅夫写道：“我很想和读者谈一谈，希望哪怕能够告诉他们25年积聚在我心中的一小部分往事。”

这些“往事”如这部回忆录的题目所指，可以划分为“文学”和“生活”两大部分，两部分的篇幅也大致相等：文学艺术方面的回忆录有五篇，即《普列特尼约夫家的文学晚会》、《回忆别林斯基》、《果戈理》、《阿尔巴诺和弗拉斯卡蒂之行》和《关于〈父与子〉》；对“往事”的追忆有六篇，即《戴灰色眼镜的人》、《我们的人派来的！》、《特罗普曼的处决》、《关于夜莺》、《贝加兹》和《海上失火记》。在这些回忆录中，前一组似乎更为后来的研究者和读者所重视，尤其是《回忆别林斯基》和《关于〈父与子〉》两篇。这些文字的确有着极其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价值，正如它们的译者张捷先生所言：“所有这些作品一方面为我们了解这位杰出的作家和他的某些同时代人的生活经历、思想政治观点的演变和创作道路的发展提供了翔实材料，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更正确地理解他生活和创作的时代的特点以及社会思潮的起伏和文学的发展状况。”

屠格涅夫的“生活回忆录”，尤其是他描写法国生活的篇章相对而言受关注较少，但如今我们发现，若就纯粹的散文阅读效果而言，